

独白

纪录片导演冯都：女书，一盏在我们内心发光的灯

人物简介

冯都，纪录片导演、制作人、编剧。主要作品有《南京》《我只认识你》《港湾》。

■ 口述：冯都 纪录片导演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纪录片《密语者》的两场分享会结束，影片的导演冯都笑盈盈地走出放映厅，看着首都电影院大厅里争相挑选女书周边的影迷们，她掏出手机像个旁观者一样记录下了那一刻。此时的她，脸上写满了如释重负。在此之前，纪录片《密语者》已经得到了业界的肯定，获得多项国际电影节奖项，并入选第95届奥斯卡纪录长片短名单，但冯都更在意的是主人公胡欣第一次看片时的反应，以及首映礼后观众给予的反馈。最终，她得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密语者》讲述了两代中国女性通过女书寻求自我突破、独立与成长的故事。女书，作为秘密相传千年的文字，对于当代女性，究竟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艺术形式、一种交流方式？还是一种心灵慰藉？或许从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导演冯都的采访中能够找寻到答案——



用纪实影像讲述女书故事

在《密语者》之前，我一直从事纪录片的拍摄工作，所拍摄的纪录片都与中国相关。对我来说，纪录片的最大魅力在于通过故事的力量引发观众的共情，从而触动大家的思考。也正是因为我在纪录片领域的长期积累，让我开始关注到女性导演。此前，我一直在幕后担任制片人，与众多国内年轻的女性导演有过合作。在我看来，女性观察社会和世界有着独特的视角及讲故事的方式，所以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持她们。

后来，我和《密语者》的联合导演赵青一起制作了一部讲述阿尔茨海默病的纪录片《我只认识你》，主人公是我的叔公和叔婆。这部电影为推动中国社会影响力做了三年的工作，在全国多个城市的社区进行放映，让老人认识到认知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疾病。透过我叔公和叔婆的爱情故事，让大家了解认知症患者所处的困境，并消除对认知症患者的偏见。

我一直在关注当下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这种关注也延续到了对女书的探索中。

了解女书，我是从一本叫《雪花秘扇》的小说开始的，它讲述了在19世纪湖南的一个村落里，两个年轻女孩通过“女书”结为“老同”（结拜姐妹）并相伴一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女书本身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我惊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在面临极其艰难的生存状态时，竟然能创造出这样一种特殊

的文字。因为这个契机，我开始走进女书的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017年，我的人生步入了一个十字路口，初为人母，要扮演此前未曾设想过的女性角色。对于生育、养育、事业以及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等所有角色该如何权衡，当时的我觉得异常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女书，想到当时的女性在远比我们艰难的情况下，没有选择放弃或者自怨自艾，而是选择了用女书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平台，给自己力量。这种力量深深打动了我也符合我当时的心境。于是，我决定拍摄一部关于女书的纪录片。

两代女书人的深情相伴

在构想电影的呈现方式时，我不想把它拍成历史题材、人文类的纪录片或专题片，我希望女书活跃在当下，因为它需要被看见，我们也需要它。我期望通过女书来了解当代年轻女性的生活状态，于是便开始寻找与女书相关的年轻女性作为影片的主人公。胡欣出生在女书的流传地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江圩镇，是当时最年轻的女书传承人，在女书传承与传播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决定邀请她来作其中一位主人公时，她正处于婚姻的重要关口。有一次和她通话，谈及婚姻她崩溃大哭，我说：“你别动，我过去。”那时的我们不再是记录者和被记录者，而是心灵相通的伙伴。

通过胡欣，我认识了很多女书的爱好者和宣

传大使，吴思慕便是其中一位。她曾经跟随胡欣学习女书，多年来一直积极与其他女书爱好者保持交流。选择思慕，是因为我想拍摄一位农村女性和一位城市女性，毕竟她们在不同环境下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各不相同。恰巧在拍摄时，思慕也处在一段不太愉快的亲密关系中，影片记录下了她从而对困境到走出困境的成长过程。

在深入了解女书的过程中，我还读到了一本叫作《折扇》的书，其中记录了一位叫何艳新的阿姨坎坷而坚韧的一生。那时，我并不认识她，但通过阅读，却感觉与她的心无只比贴近。第一次见到何艳新时，她给我的印象是善良、坦荡且有风骨，与书中的刻画相契合。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同样生活在女书的流传地江圩镇，何艳欣自小从外婆那里习得女书，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接触和掌握。之后在机缘下开始参与女书的翻译和传承工作。

两代主人公何艳新与胡欣年龄相差近50岁，然而在纪录片中，她们之间自然流露出来的姐妹情谊，是我在拍摄时未曾预料到的走向。也正是和何艳新之间的姐妹情帮助胡欣度过了她最艰难的時刻。

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对于女性间的姐妹情的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我认为，真正的姐妹情意味着包容、认可和接纳。女性对于自我性别的认知会因所处的地域、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的差异而不同，且一生会随着阅历增长和角色变化而不断改变，这是一个持续再认识的过程。就像胡欣和思慕，在某一时间点也会有到

结和压抑，而后重新在所处的外在环境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这是必经之路。我们不能只认可走在前面的，而忽视那些陷入困境的姐妹。只有通过彼此身心相通的对话与分享，我们才能够拥有更深刻的性别认知，从而继续前行。

借助《密语者》开启两性真诚对话

最初在筹拍这部影片时，我希望组建的是一个女性化的团队。但后来发现这样不对，因为我想要呈现的是当下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对性别价值的刻板预期之间存在的差距。所以，发起两性间的对话十分必要，这只有让男性参与到影片拍摄中才能达成。

后来，我和两位优秀的男摄影师进行了合作，其中一位叫魏高。他有个职业习惯，就是每天在拍摄完成后，会把素材拿回宾馆，不管多晚，他都会逐条观看并进行解读，然后向我分享他作为男性的观点。交流分享后，我们会一起讨论接下来的拍摄计划。这部纪录片拍摄结束后，他的女儿出生了，他成为一名父亲。当时的他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谢谢你让我参与了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因为我在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以及如何教育女儿这件事上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条信息我至今仍然保留着。

我认为，在全新的时代和社会格局下，男女两性展开对话，思考当下如何形成新的性别价值认知，进而实现新的平衡与对等，是极具意义的。这种平衡并非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是更为广泛。例如，如今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拥有出色的事业和明确的人生规划，她们依旧需要找到一位在各方面都优于自己、强大且能引领自己的男性来获得安全感吗？而男性或许仍在寻觅贤妻良母、温柔体贴型的伴侣，但他们是否能先尝试充当贤父良母的角色呢？只有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刻板预期，才能真正把彼此视作鲜活的个体来对待和尊重。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了对话，才能够更好地看见和理解彼此。

而女书对于当代女性而言，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于我而言，女书是女性之间交流的一种工具和平台，但是我们并不完全依赖女书去交流，而是去体悟这个平台所承载的价值。当我们感到自己的内在世界难以达到某种平衡时，能够寻得一个出口，借助交流与其他女性分享。一旦你鼓起勇气交流，便会发现大家的处境也许是相通的。以交流为起点，女性间可以从彼此身上收获安慰，也能获得力量。

这种姐妹情谊也是全世界共通的。《密语者》在很多国家进行了放映，一些国外的女性观众在观影后会对我说：“你认为在这边我们的情况会不同吗？”实际上，女性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大家所面临的困境、内心所受的一些压抑和纠结都是相同的。《密语者》在挪威拿了三个奖项，在俄罗斯拿了两个奖，在完全预料不到的地方获奖，我想这可以窥见女书在当下存在的意义。

它就像一盏能在我们内心发光的灯。

漫谈·我与文学

杜京：看不完的世界，写不完的故事



人物简介

杜京，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四度荣获中国新闻奖及数十项国内外新闻奖项，所拍摄的图片曾荣获中国摄影新闻奖。两度荣获“波兰共和国杰出贡献勋章”“波兰共和国军官十字勋章”。

■ 口述：杜京 高级记者、作家、摄影家
■ 记录：范语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当我们目光投向欧洲的“心脏”，可曾知晓维斯瓦河流过的那片土地所承载的文明与风光？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提及波兰，心中也许只有或浪漫或神秘的模糊印象。而对于记者、作家杜京而言，这里早已成为她无数次踏足流连、用笔温柔描摹过的地方。

凭借《我，文化 波兰》《琥珀色的格但斯克》《四季波兰》等多部书写波兰文化的著作，杜京于2018年获得了本尼·梅里托(Bene Merito)波兰共和国“杰出贡献勋章”——这是波兰外交部长授予波兰和外国公民的特别勋章，以表彰他们促进波兰与各国之间友谊作出的重要贡献。

今年夏天，这个远方的国度再一次为杜京的文学贡献送来赞誉。6月23日，波兰总统杜达亲自授予杜京女士“波兰共和国军官十字勋章”，表彰她向中国读者介绍波兰，为增进波中友谊作出的突出贡献。

作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记者和作家，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采访时，杜京表现得很平静。或许，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书写不同文化的闪光点、书写这个斑斓动人的世界，已经成了她的习惯与本能。谈起对文字钟情、与波兰结缘的故事，杜京娓娓道来——

三个改变世界的波兰人，吸引我走近波兰

说起欧洲，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时尚之都巴黎、永恒之城罗马，波兰这个国家的存在感似乎不太强。我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那时候部队大院里有叫作“华沙”的轿车，父亲告诉我，欧洲有一个国家叫波兰，波兰的首都是华沙。而我的母亲喜欢音乐，家里有一台留声机，她经常买回喜欢的唱片与我一起听，我听得格外入神的，便是肖邦的乐曲。这可能就是我儿时对波兰的朦胧印象。

2006年，我作为新闻代表团团长与其他媒体的几位记者一行踏上了波兰的国土。数日寻访中，三个改变世界的波兰人令我对波兰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在当时惊世骇俗的“日心说”，更正了人们的宇宙观；音乐家肖邦虽已经离开我们200多年，但他的音乐永远跨越时空，与世界共鸣；而居里夫人更令我钦佩，她发现了两种放射性元素镭和钋，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这个人口仅3800多万的国家，其文化的创造力、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超乎我的想象。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人与人的交往如此，不同国家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于是，我开始研究、书写波兰的历史、政治、文化。这些年来，我采访过波兰的前总统、总理、教育部长，与波兰戏剧、电影、音乐等艺术界的人士畅聊，也对话过波兰的厨师、手工艺者和普通百姓。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乐观真诚、善于学习的品质，也一次次被他们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对自己民族与国家的热爱所感染。在走访波兰三次后，我的第一本书《我，文化 波兰》便写就出版，与波兰的缘分也一直延续至今。

今年6月初，波兰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给我发来消息，询问我6月23日是否在京，邀请我参加活动。由于2018年已经获得过一次勋章，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再次获得荣誉，并由波兰总统亲自授勋。这也让我更加感受到，波兰对于文化创造者、传播者一贯的尊敬。当天，我穿着一身中国红领受了勋章。能够通过自己的书写，为中波两国文化交流做一些事情，我一直乐在其中。

是记者亦是作家，在书房也在路上

虽然对波兰情有独钟，但波兰并非我写作生涯里的全部风景。我对写作的热爱，或许在幼小时就埋下了种子。我父亲爱看书爱写作，他主张我们多读报纸，认为读报不仅可以认字，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当时我常看家里订的《参考消息》，那时懵懵懂懂，在新闻里看到古怪的外国地名，就会刨根问底，喊爸爸给我讲。我对这些陌生的、遥远的地方充满好奇，梦想自己能做一只鸟，在自由的天空中飞翔，每一片羽毛都沾满太阳的光辉。

长大后，我很幸运地走上了儿时渴盼的道路。1982年，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1986年，我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从那时起，我在《云南日报》做过文艺部的记者、编辑，担任过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也在《北京日报》担任过时政部的主任，从未离开过一线记者这个岗位。

现在回头看，做新闻记者和散文作家，对我而言是相辅相成、互有裨益的，都是用文字去表达思想和心情。在采写时政新闻的时候，我不喜欢刻板的、干巴巴的写作方式，总

想用更美的语言、更有温度的细节给稿件增添一些鲜活的色彩。常常在发完篇幅有限的时政报道后我还不过瘾，就会再用散文或报告文学的方式，写出新闻事件背后更多的故事。散文写作的功底，让我的新闻表达更加生动。

而几十年的新闻记者生涯，让我得以见证国家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得以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与事，这给我的散文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也训练了我敏锐的洞察能力。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奥运健儿的激烈角逐，但我对领奖台上大家手捧的红色花束产生了兴趣，迅速联系采访，得知这种中国红月季来自云南，是真正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花朵，配花与配叶也极有讲究。事后我从奥委会秘书长那里得知，当时全国21600多名记者聚集北京，只有我关注到了那束花。我还顺着这个思路，关注了世界各国国花背后的故事，出版了《跨越国界的芬芳》一书。

是记者，也是作家，我很感谢这两重角色一直到现在都不断拓展着我人生的宽度，也让“一半时间在书房，一半时间在路上”成为我生活与创作的常态。这些年来，我几乎走遍了所有小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的国家与地区。无论因为工作还是旅行，只要有“走出去”的体验，我就一定会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我很少看电视，只要走进书房，拿起书本和笔，脑子里就浮现出看不尽的世界，写不完的故事……

我关注成功女性，也关注平凡女性

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国内，我在采访、书写人物时，总是格外关注女性的故事和命运。这可能与我自己作为女作家的性别身份、独特体验有关系。

虽然我们生在男女平等的时代，但由于女性承担着生育角色，要同时兼顾自己的职业和家庭，就要付出更多精力。我也不例外，我爱人是一名军人，儿子小的时候他几乎都在外地。有时候与采访对象约定的时间在晚上，孩子总是哭闹着不让我离开。记得有一次我回家，孩子眼泪汪汪地请求以后跟着我一起去采访，保证不会打扰我的工作，我当时觉得很心疼很难过。当然，我从来没有放松过



我，文化波兰

杜京著



杜京著



四季波兰